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第二辑)

总主编/李玉明

晋国 晋国 音乐 大军 师事 家先 师旷 轸

杨迎祺
/ 著

王晓枫
/ 著

奠定晋国强盛基础的是晋国层出不穷的人才。晋国大臣先轸既有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又有兵学理论著作。可以说他是比孙武还要早 100 多年的大军事家。晋国的主乐师师旷，辨音准确，琴艺超群，是一位流芳千古的音乐大师。



山西人民出版社

复 审:甘 弋

终 审:杭海路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二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晋国大军事家先轸 晋国音乐大师师旷/王晓枫、杨迎祺著.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1. 3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 第2辑/李玉明主编)

ISBN 7-203-04188-3

I. 晋… I. ①王…②杨… III. ①先轸—生平事迹
②师旷—生平事迹 IV. K820.825

5 晋国商业文化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5410 号

6 晋国的兴衰

7 山西晋城

8 山西塔文化

9 广 晋国大军事家先轸 晋国音乐大师师旷

10 法显西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2辑)

王晓枫 杨迎祺 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030012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0351-4922102

<http://www.sxep.com.cn> E-mail: sxep@sx.cei.gov.cn

新华书店经销 太原市新华胶印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5.25 字数: 302 千字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太原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套)

*

ISBN 7-203-04188-3
K·204 定价: 30.00 元(套)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顾 问：王 谦 李立功 王庭栋 马 烽

姚奠中 侯伍杰

主任委员：赵雨亭

副主任委员：李玉明

委 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马玉山	马志超	王志超	王宝库
王灵善	牛崇辉	申维辰	白 云
任茂棠	刘 江	刘 巩	刘在文
刘纬毅	刘贯文	成葆德	齐荣晋
李元庆	陈扬炯	陈墨章	张 领
张国祥	张捷夫	罗广德	赵劲夫
赵瑞民	赵曙光	高专诚	高培湖
陶正刚	柴泽俊	阎广洪	梁豫秦
谢洪涛	楚 刃	雷忠勤	

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第二辑)

- 1 唐尧文化与中国文明起源
- 2 晋国史话
- 3 唇亡齿寒的故事
退避三舍的故事
- 4 晋国大军事家先轸
晋国音乐大师师旷
- 5 晋国商业文化
晋国巨商猗顿
- 6 晋商的兴衰
- 7 山西古战场
- 8 山西塔文化
- 9 广胜寺与《赵城金藏》
- 10 法显西行取经
慧远南下传教

目 录

一、战争频繁的时代和不平凡的人生经历	(1)
二、忠于国事、勇于献身的高尚品质 ...	(4)
三、多谋善断的过人胆略和指挥若定的军事才能	(7)
1. 决战决胜的过人胆识	(7)
2. 胸怀全局的战略眼光	(9)
3. 灵活机动的指挥艺术	(10)
四、历史功绩不可磨灭	(17)

一、战争频繁的时代和不平凡的人生经历

春秋时期的中国社会，由于新、旧政治和经济因素的矛盾，各诸侯国统治阶级之间、各诸侯国贵族阶级内部的杀伐争夺，是非常激烈而又残酷的；侵略和兼并战争，几乎是无时无之。据史书记载，春秋时期的242年里，列国间共发生各种大大小小的战争483次，几乎平均每年两次。同时，列国间还举行朝聘会盟450次，也是几乎平均每年两次。朝聘会盟虽以彬彬有礼的外交形式出现，实质上却是战争的继续，是没有硝烟的战争，由此可见当时列国之间倾轧争斗之激烈。

时代呼唤人才，时代造就人才。在战争如此频繁的年代，大量的军事实践活动，必然会造就一大批军事谋略家、指挥家和军事理论家。这是春秋时代兵家人才辈出、兵学著作繁多的根本原因。然而，一提到春秋时代的兵家及兵学著作，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军事理论家孙武及其军事哲学著作《孙子兵法》十三篇；却很少有人知道，早在春秋中期的晋国，就出现了一位很了不起的大军事家先轸。先轸既是军事谋略家，也是军事指挥家；既有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又有兵学理论著作。而且他的军事活动要比孙武早100多年。

先轸，春秋时期晋文公、晋襄公时代的正卿，既执国政，又掌兵权，因为当时晋国实行的是军政合一的行政体制。先轸约生于晋武公二十七年（前 680 年）前后，卒于晋襄公元年（前 627 年）。因为他的采邑在原国旧地（迁徙之前在今山西沁水，迁徙之后在今河南济原县西北），史书上又称原轸。先姓是晋国著名的卿族，其来源颇早。甲骨刻辞中所载的商末山西境内的诸多方国，其中即有先姓国族。《左传》也记载：“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商有姚、邳。”意思是说，虞舜有三苗氏部族为敌，夏朝有观扈氏部族为敌，商朝有姚、邳氏部族为敌。姚就是先，可见先部族曾是商的强敌。先国在当今山西的具体地理位置虽难以考知，但春秋时代晋国大夫先后有先轸、先且（jū）、先克、先蔑、先都等，他们无疑是以国为氏的先国部族的后裔。

先轸早年即为国内知名的贤士，同少年时期的晋公子重耳相友善。晋献公二十二年（前 655 年）骊姬之乱发生，先轸同狐偃（即子犯、重耳的舅父）、赵衰、魏武子等人随重耳出奔戎狄，后又周游卫、曹、宋、齐、郑、楚、秦等国，历时 19 年，备受艰辛磨炼，养成忠公多谋的品格和才干。公元前 636 年，晋文公重耳借助于秦国的力量，返回晋国即位，大肆封赏功臣时，先轸自然要受到重用。公元前 633 年，晋文公作三军（原来仅有上、下二军），先轸以“有谋”而得任下军之佐（副统帅），位列六卿。次年，晋军东出解救被楚军围困的宋国（今河南商丘），先轸出谋袭取卫国的要邑五鹿（今河南濮阳东北），因功以下军之佐被越级擢升为中军尉（统帅），执晋国国政（当时，原来的中

军尉郤穀病卒)。从这时候开始，先轸成为晋国军事、政治方面的主要决策人物，为晋文公建立霸业所依重的肱股之臣。

晋文公即位的当年（前 636 年）冬天，周王室发生内乱，周襄王战败出逃，同时向秦国和晋国求救。晋文公听取了先轸等人的意见，认为这是获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的绝好机会，于是当机立断，辞退秦师，出动全部晋军兼程倍道，赴雒邑（今河南洛阳市）勤王。结果，晋军一举平定了叛乱，建立了安定王室的功勋，在诸侯中引起极大震动。周襄王在危难中获得晋国的解救，把畿内八邑，即：阳樊（今河南济原县东南古阳城）、温（今河南温县西）、原（今河南济原县北）、州（今河南沁阳县东）、陘（今河南沁阳县北）、緡（今河南沁阳县西南）、钐、攢茅（今河南修武县北）赐给晋国，以示嘉奖和酬谢。晋国得到的这片领地，就据有了以后出兵中原的前沿阵地。

在公元前 633 年的晋楚城濮之战中，先轸料敌如神，指挥有方，大破强楚，威震华夏，为晋文公称霸中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公元前 627 年的秦晋崤山之战中，先轸出谋果断，全歼秦师，进一步巩固了晋国百年霸业的基础。晋国自昭侯以来，100 多年中王位的篡弑争夺史不绝书，况且土地狭小，大国在侧，戎狄逼临，国家多难。虽然晋献公时晋国扩张到现今的整个晋南地区，国势有所振兴，但献公晚年失政，酿成骊姬之乱。尤其是晋惠公、晋怀公父子更是丧失民心，开罪友邦，把国家的内政外交搞得一片混乱。因此，晋文公即位后，如果不大力刷新政治，奖励

耕织，整军经武，就很难在大国环视威逼的环境中站稳脚跟。据史籍记载，当时能够真正帮助晋文公“畜（蓄）爱百姓，厉养戎士”的，实际上只有三个人，这就是子犯、先轾和阳处父。但经考证，阳处父由赵衰推荐，于晋文公末年担任太子姬驩（即晋襄公）的太傅，他的用事以至显赫主要是在晋襄公时代。而晋文公在位的9年当中，文能够安邦、武能够治兵，实际上只有子犯和先轾两人。只是由于历史记载缺乏，使我们对先轾执政期间厉行改革的政治业绩无从详尽考查罢了。

二、忠于国事、勇于献身的高尚品质

作为三军统帅，忠诚谋国、勇于献身，是其必备的品格，也是历来国君选拔将帅的首要条件。由于晋国历史上曾接连发生过曲沃灭晋翼，献公诛桓、庄之族，骊姬驱逐群公子等统治阶层的亲族骨肉相残事件，宗法血缘纽带过早地被割断，使得晋国公室宗族势力极为孤弱，而国君权力便相对集中，便于摆脱任人惟亲的“亲亲”观念，实行任人惟贤，从而形成了尚公、尚义、尚贤和尚法的优良传统。因而，晋国的士大夫，一般都能重于国事，不计私仇，勇于公敌，怯于私斗，形成了忠勇体国、急公好义的良好道德风尚。如程婴、公孙杵臼、韩厥等人冒死保护赵氏孤儿，鉏鞮刺杀赵盾触槐而死，魏绛戮晋悼公之弟杨干之御，祁奚荐贤“一不避亲，二不避仇”，豫让舍身刺杀赵襄子为智伯报仇等，都是明显的事例。而这种优秀的精神品质，在

先轸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晋、秦崤山一战，数万秦师全军覆没。秦军统帅孟明视、西乞术和白乙丙也做了俘虏，被押回晋国的宗庙所在地曲沃，拟当作牺牲，来给停柩待葬的晋文公举行葬礼。不料，孟明视等人却暗中活动于晋襄公的母亲文嬴。文嬴乃是秦穆公的亲生女儿，出于私情，以“秦欲得其三将而戮之”为借口，劝说晋襄公下命令释放三将，以便同秦国修好。晋襄公年少无知，竟然听信了母亲的劝说，下命令释放了孟明视等人。

第二天，先轸早朝时询知此事，一时怒不可遏，竟然不顾君臣的礼节，当众对晋襄公喝道：“患生矣！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隳军实而长寇仇，亡无日矣！”意思是说，祸患将要发生了。当兵的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在战场上把他们抓住，妇道人家一张口就把他们都放走了。这里毁坏军队的胜利果实，又增长敌人的力量，我们亡国的日子没有多久了！先轸说罢，“不顾而唾”，不扭头就向晋襄公面前吐了一口唾液，然后扬长而去。先轸急派大夫阳处父率兵追捕孟明视等人，不料追到黄河岸边时秦国早已派军接应三将上船脱险。阳处父急中生智，立刻解下战车的驂马，假借国君的名义向三将赠马送行，想诱使三将上岸，再行捕获。但三将哪里再肯上岸，一齐愤恨地向阳处父挥手说：“感谢晋君的不杀之恩，哪里还敢接受礼品！如果我们还活着，那么，三年以后再见！”

正如先轸所预料的，释放秦国俘虏，就意味着晋国的灾祸即将来临。三年之后，即公元前 624 年夏天，秦穆公

果然亲率大军伐晋复仇，依然用孟明视等人为将。秦兵浩浩荡荡从三官渡（今陕西大荔县澄城西北）穿过黄河，过河后就焚舟，以表示赴死的决心。秦师锐不可当，直取晋之王官（今山西闻喜县南），一直打到晋都绛郊。晋军大败之后，坚守不战，秦军遂南撤，由茅津渡一带渡河，掩埋了崤山死难秦兵的尸体，报仇雪耻而还。秦军此战的胜利，为秦国称霸西戎奠定了基础。

由此可见，先轸情急盛怒之下，在晋襄公面前的无礼表现虽有粗鲁失敬之处，但其出发点却完全是为晋国的公利着想，不夹杂丝毫的私心杂念。不料，此后先轸出于愚忠的道德观念，对自己在国君面前的失礼举动，十分懊悔，不断地自责自谴，最后竟至于因此而殒命自赎。

公元前 627 年，狄国君主白部胡举兵伐晋，晋襄公敦请先轸挂帅出征。先轸认为自己唾污君面，失掉大礼，不配担任三军统帅，因而固辞不就。后经晋襄公再三劝慰，先轸这才感激受命，并在晋国东北边境的箕城（今山西左权县芹泉镇芹山）一带山地设伏大破狄兵，斩了敌酋白部胡的首级。但是，正当大获全胜之际，先轸出于愚昧的忠君思想，悔恨自己唾而辱君之罪，决心就此杀身自赎。于是，他自言自语道：“匹夫逞志于君而无讨，敢不自讨乎？”意思是说，在国君面前耍威风却未受惩处，哪里敢不自我惩处呢？于是，他便扔掉盾牌，自去盔甲，直挺挺地站在战车上，冒着箭矢冲入敌阵，同前来增援的狄兵肉搏血战，终因迎面受箭而死。

毫无疑问，先轸的这种行为决不是自私怯懦，而是勇

敢刚毅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很受人们尊敬的。尤其是先轸壮烈地牺牲在战场上，为国家献出自己的生命，更为人们所敬仰。先轸阵亡后，晋国上下悲痛哀泣。晋襄公率领文武百官和晋都百姓，为先轸举行了十分隆重的国葬，并任命先轸的儿子先且居继任中军之帅，执晋国国政。国人感念先轸忠公智勇，在箕城给他建立了祠庙。先轸祠原址在今左权县城南 1 公里的庄子村，金大定年间（1161 年—1189 年），辽州（今左权县）刺史赵扬曾为之撰《先轸庙记》，元代皇帝曾赠封“晋大夫先轸之神”，明洪武七年（1374 年）曾赐额“晋大夫先轸之庙”。至今，每年农历五月上旬，先轸祠附近总要举行盛大的庙会，可以说是人们致祭先轸的遗风不绝。

三、多谋善断的过人胆略和指挥若定的军事才能

1. 决战决胜的过人胆识

作为三军统帅，先轸敢于向强敌宣战，敢于以弱胜强、以少胜多，具有决战决胜的过人胆识。这一点在关于城濮之战的决策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公元前 633 年，亦即晋文公即位的第 4 年，多年来锐意进取中原的楚国，胁迫曹、卫、陈、蔡等国家，组织联军围攻当时晋国在中原第一个可靠的盟友宋国，宋国只好向晋文公告急求救。这实际上是城濮之战的前奏。当时，楚国是楚成王当政。楚成王雄才大略，在他近 40 年的治理之下，楚国的政治经济改革卓有成效，军事实力十分强大，多

年来不断侵伐和蚕食中原诸侯，几乎每年都向北方用兵，其势力已达今河南、山东一带，几乎控制了黄河以南的所有地区。而晋国在重耳即位后，为了制止楚国势力继续向北方扩张，虽也修明内政，整军经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因为时较短，经济和军事力量还远未达到足以压服楚国的程度。加之楚军人多势众，又有曹、卫、陈、蔡等盟国的支持，而晋军势孤，在地理环境上又不靠近宋国，中间还隔着曹、卫等敌国，后勤补给十分困难。因此，当宋国告急乞援时，晋文公畏惧楚国的强大，一时难决。

然而，先轸却已经预见到晋、楚之间的直接冲突，乃至兵戎相见，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复兴的晋国想要发展壮大，必须同决意北进的强楚决一死战。当年重耳一行流亡到宋国时，宋襄公曾优礼有加，如今解救其危难，也正是对宋国恩德的报答。尤其是宋国正处于楚国中原盟国曹、卫、陈、蔡之间的中心地带，所以，救宋之举对于建立晋国的霸权，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正如先轸所说：“报施，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这就是说，报答宋国的恩施，挽救宋国的危难，提高晋国的威望，奠定霸业的基础，就在此一举了。

显然，先轸的建议高瞻远瞩，合情合理，从战略的宏观角度，指出了晋国出兵救国的政治利益所在。由此可见，正是先轸的过人胆识才促使晋文公下定救宋抗楚的决心，促成了晋国对城濮之战的正确决策。而在后来的崤山之战前夕，一开始也持反对态度，害怕强秦，而先轸面对强秦的挑战，依然是最强硬而又最清醒的主战派。为了国家利

益，他寸步不让，敢于力排众议，甚至不怕得罪国君而犯颜直谏，表现出一个军事家的超人胆略和大无畏的精神。

2. 胸怀全局的战略眼光

作为三军统帅，先轸能够胸怀全局，从整体上把握战略目标，从政治角度考虑战略问题，从长远影响来预测战争后果，具有军事战略家的眼光和识见。如前所述，城濮之战尚在酝酿之中，先轸即已洞见晋、楚军事对抗和决战的不可避免，而且把救宋之役同国家“取威定霸”的整体利益和长远战略目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在关于崤山之战的决策中也有鲜明的表现。

公元前 628 年 12 月，晋文公在位 9 年后病卒。他的儿子姬驩年幼即位，这就是晋襄公。正当晋国君臣为文公举行葬礼的时候，多年来处心积虑地要控制晋国、称雄中原的秦穆公，认为这是秦国向东方发展的大好时机。也正好在这个时候，郑文公新亡，郑国也处在国丧期间。于是秦穆公决计以郑国为战争目标，进军中原。他不顾蹇叔、百里奚等元老大臣的阻拦，命孟明视等人率军，东出潼关和函谷关，跨越晋国领土（今河南省西北部），长途奔袭郑国。但因郑国事先察觉，有了准备，秦军偷袭不成，转而灭掉晋国的属国滑（今河南偃师县南）。按照当时的惯例，一个国家的使者或军队，不得已经过别国的领土时，应派使者向该国陈述通过理由和通报通过人数，得到东道主允许后方可通过，这就是所谓假道。秦兵乘人之危，过境而不假道，又袭灭晋国的边邑滑，这是对晋国的严重挑战。作为晋国执政和军队最高统帅的先轸，主张立即出兵崤山，拦

击秦师。先轸认为，秦穆公不听从蹇叔的劝阻，因为贪婪而兴师动众、劳民伤财，这是天赐的伐秦良机。后来的事实证明，先轸的这一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然而，先轸拦击秦师的正确主张却遭到晋襄公和大夫栾枝等为首的大多数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秦穆公帮助先君重耳返国主政，对晋国有大恩大德，因而讨伐秦师就是“负吾先君，败邻国之交而失孝子之行”。面对这种情况，先轸进一步指出，对于狂悖无理的秦国来说，无所谓报施不报施；如今讨伐秦师是为子孙后代着想，这不仅没有辜负先君的重托，而正好是对先君尽忠尽孝。如果今天放走了敌人，那将是后世的祸患啊！襄公终于采纳了先轸的主张，于是下令出兵崤山，不但一举大败秦师，还生俘了孟明视等三位秦军统帅。

晋文公、襄公时代，周天子的王权已经衰微，而晋国的政治改革和法治建设则卓有成效，经济和军事实力急剧增长，正是晋国霸业方兴未艾的时期。在“尊王攘夷”的旗号下，通过军事手段提高国家威望，遏制秦楚强国向中原扩张，解除北方狄人对中原的威胁，这是时代赋予当时晋国的历史使命。具有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晋国执政和三军统帅先轸，纵观天下大势，时时事事从国家的战略总目标出发来考虑和处理军事问题，因而能够总揽全局，谋及深远，表现出过人的识见和气度。可以说，正是当时特定的时代条件和时势需要，才造就了先轸这样具有战略头脑的军事家。

3. 灵活机动的指挥艺术

作为三军统帅，先轸具有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和驾驭战争的军事指挥才能，善于调查研究，深入分析敌我形势，并配合外交手段争取友军和瓦解敌人，从而运用灵活多变的作战方法，牢牢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赢得战争的全面胜利。这一切，都在城濮和崤山两大决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城濮之战是以楚国攻宋、宋向晋国求救而拉开序幕的。本来，楚国攻宋已使晋国出师有名，但晋文公在流亡期间曾得到楚成王特别的礼遇，加之楚军势大，因而不愿意主动与楚军直接交锋。于是，晋文公采纳了狐偃的建议，以文公流亡期间曾遭到曹、卫两国的冷遇非礼为借口，首先发兵攻击楚国的新盟友曹、卫二国，以迫使楚军来救曹、卫，则宋国之围不战自解。

公元前 633 年 12 月，晋国三军悉起，计划假道卫国南下击曹。在遭到卫国的拒绝后，第二年正月，先轸先声夺人，率军袭取卫国的五鹿，不久，又攻下了卫国的敛孟（今河南濮阳县东南），卫国危若垒卵。卫人借机驱逐卫成公，立成公的儿子叔武为君，背叛楚国，归服晋国。晋军的主力则渡过黄河南下，经过三个月的激战，攻下曹都陶丘（今山东定陶县），活捉曹共公，送给宋人，以激怒楚人北上救曹。不料，楚军来不及救曹，便加紧攻宋，妄图迫使晋军退出曹都，于是，宋人再次向晋军告急求援。

面对强楚的优势兵力，是否出兵救宋来同楚军直接对抗，又使晋文公畏惧忧疑。不救宋吧，眼见宋国就要和晋国绝交而倒向楚国；通过外交途径呼吁楚国罢兵撤围吧，楚国肯定不会答应；出兵救宋吧，那就要冒死同楚军决战，孰

胜孰负实在难以预料，而且齐国和秦国又不答应向楚开战。晋文公深知此战关乎全局，后果十分严重，因此忧惧有加，疑虑重重，甚至害怕得连做梦也梦见楚成王在吃自己的脑髓。在这紧急关头，又是多谋的先轸献出了一个三全其美之策：一方面让宋国自己出面贿赂齐、秦两个大国，让他们站在宋国一边说话，劝楚国撤军解宋国；一方面晋国把所占领的曹、卫的土地分给宋国，来补偿宋国贿赂齐、秦的损失。这样，楚国就一定会因为自己的盟国曹、卫被分割，而拒绝齐、秦为宋国撤兵解围的请求。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那么楚国就得罪了齐、秦两个大国，而齐、秦既贪图宋国贿赂，又恼怒楚国的顽固不化，能不来增加对楚国的战争吗？

这里，先轸所谋划的是一个决胜全局的策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个策略的指导思想，就是组织起强大的抗楚统一战线，其要害是离间齐、秦同强楚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使齐、秦两个大国在晋、楚对抗中，由消极的中立转变为积极的参与，从而使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晋国的变化，同时，又在紧要关头坚定了宋国坚持抗楚的信念和决心，尤其是有利于彻底打消晋文公的忧惧心理，树立抗楚必胜的信念，这对战争全局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先轸的足智多谋，由此可见一斑。

先轸的预谋果然收到了实效。时值楚成王亲率大军北上前来救曹、卫，当他得知曹、卫已被晋军占领，而齐、秦又对楚军围宋采取积极干预态度之后，便主动率军返回申（今河南南阳市北），并命令前线指挥令尹子玉（得臣）避